



【文人谈】

又是一年樱花季

□薛原

青岛中山公园里的樱花又开始绽放了。这个时节绽放的自然是单樱，双樱要到四月底才能盛开。走在樱花大道上，不由想起作家何为曾描述的这条大道，他当年来这里看樱花时，这里还是泥土路，遇到了他之前在列车上相遇的一位少校。何为看过的樱花距今已经过去快七十年了。而在此之前，作家艾芜也描述过这条大道上的樱花季——距今已经九十年了。

艾芜描述的是1935年春天的樱花大道，他和家人来到的青岛第一公园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他们来的那天“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夜来落过雨，路都是微微润湿的，散步的游人，就沾了光，再不像往天似的，会那汽车扫过来的灰尘”。那时的樱花大道，还是可以跑汽车的，而且在干燥的季节，汽车跑过会带起泥土路上的尘土。这条樱花大道，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还是泥土路，可以跑汽车的，后来就硬化了地面，变成了沥青路，而且成了步行大道。

艾芜在《青岛的公园》一文里写道：“大约由于上午的缘故，公园里很少遇见摩登的男女，缓缓走在樱花树下的，却大半是些平常的商人和乡下来的粗汉子。由这一点，青岛公园之能与众同乐，不像上海公园需要出钱游玩，到底是值得赞美的。”艾芜是从上海来青岛的，他对上海公园和青岛公园的对比是切身体验，也给那个年代青岛的公园留下了一个见证。

艾芜也记录了他另外一个角度的见闻：“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年老的女人们，将她们曾经在结婚时候为客人啧啧称赞的小脚，糟杂地印在落有花瓣的泥沙道上。大概人们对这还不感到深切的痛苦吧，一些幼小的女孩，也在拐着一双不自然的脚，正在追踪祖母、母亲的后尘呢。这在公园尚不多见，平民住的地方，却为数不少。”也就是说，在1935年春天的青岛，艾芜在青岛平民区所见的风景之一还是为数不少的小脚老太太和裹脚的女孩。

艾芜引证叶恭绰《青邱游历》一文里的话说：“市府积极劝人放脚，声明若干时后，须派人查验，曾否实行。及派女职员查验，竟有畏验而自缢者，又曾拘至期不放脚者之父兄，罚银十元，归后迁怒女子，逼之自尽，市府因此只可缓进。”艾芜感叹说：“北方人的朴实，是可敬的，但顽固的程度，却令人可怕。”

看完樱花，艾芜说，他们归途中“在海滨公园侧拾含苞的桃枝两条，插在瓶里，让春天与我们同在一些时候”，但又解释了说这桃枝“大约为乡下人所摘经警察训斥而丢弃吧”。

从《艾芜传》里可知，艾芜在1935年春天与怀孕的妻子应好友作家沙汀的召唤来到青岛，“先是住在青岛文化馆工作的单身老友王

秉心的家中，然后在海滨租到了一间公寓，两口子住了进去，靠艾芜的写作维持生活”。六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但到了九月，他们就不得不举家又迁回了上海。虽然1935年正是艾芜开始在文坛上确立自己名声的时期，例如这年三月，他的短篇小说集《南国一夜》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四月，他的散文集《漂泊杂记》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但是在青岛，他们仅仅依靠艾芜写作挣的稿费是无法维持家庭负担的。

在青岛，艾芜还写过几篇关于青岛风景的短文，例如《晨登观象山》《汇泉残垒》等。他的描述在今天看犹如呈现当年风景的老照片。例如他描述在观象山上所见当时刚刚修建完成的双尖顶高耸入云的“教堂的双塔”的雄姿，将一切建筑镇压在脚下那么似的凌空立着，好像在竭力表示自己的尊严，不受任何的惊扰一般”。而他描绘的青岛的市集，画面感也穿越百年扑面而来：“铁匠铺叮叮地敲打着铁，把自己新造出的货品，和门前摊上摆着的旧德国刀、锈东洋瓢一类的东西，挤在一块儿，图争最后生存的地位。”还有：“小药铺的檐头，晒着乌龟的尸骸，壁上贴着日本旗子的那样似的膏药商广告，丸药和药水，有的装在曾经盛过巴黎香水的空瓶子里面，如同着了西装那么似的。”

于当时的青岛，艾芜和沙汀都是匆匆过客。沙汀在青岛写下了短篇小说，而艾芜则写下了几篇散文。他俩当年在上海都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后来也都成为20世纪四川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但也不能不说，晚年的艾芜和沙汀逐渐淡出年轻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为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的作家。不像另一位四川老作家马识途——无论从文学成就，还是从文学地位上，马识途都不能和沙汀艾芜相比，但是在2010年，马识途却因为《夜谭十记》里的《盗官记》被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而跟着电影红火了起，关于马识途的种种传奇也遽然传播开来。

《夜谭十记》也与青岛有一点因缘。马识途在《夜谭十记》后记里说，1982年夏天，他在青岛疗养之际，终于写完了《夜谭十记》的初稿。但很显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像《夜谭十记》这样的小说，即便用马识途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和现代流行的小说，无论在思想、题材、风格、语言上很不一样，或明白地说，陈旧了，落伍了。谁还想看这些几十年前陈谷子烂芝麻的记录呢？谁还耐烦去听茶馆里慢吞吞地摆着的龙门阵呢？”这部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韦君宜的推动下，于1983年11月出版。之后，韦君宜又邀约马识途继续写续集，但也一直未果。后来随着电影《让子弹飞》的蹿红带动了《夜谭十记》的再版，也让马识途有了再写《夜谭续记》的信心。等到2020年《夜谭续记》出版时，马识途已过百岁高龄，令人不能不感叹世事的沧桑变迁。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出版人。)

□金后子

见到二姐，是在一家乡镇卫生院。因为化疗，二姐的头发全无，头上还有一个大包。听外甥说，是不小心摔的。人也矮了一截，佝偻着身子；身体已不能站立，一下床就得坐轮椅。看到这些，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摘掉口罩，二姐认出我后，她哭了，是放声大哭，两只干瘦的手伸向我，身体踉踉跄跄。

我蒙了。这还是我那白白胖胖、说话高声大嗓、走路如风的二姐吗？这还是我那穿越无数悲苦从不向命运低头的二姐吗？我问外甥：“夏天见面对，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成了这个样子？”外甥说：“得了这种病，不化疗不行，化疗副作用又很大。”难道疾病比晚秋的寒霜还厉害，瞬间就会把一个鲜活的生命击垮？

环顾四周，这是一间背阴的病房，里面躺着六七位病号，大都缩在被子里，只露着一个个头顶。没有暖气，一只小空调少气无力地转着，感觉室内比室外还要冷。“咱回家不行吗？”又问外甥，我加重了语气。“不行。一是她一走路就晕，随时可能摔倒，二是每天还得吃药打针，离开医院不行。”“那能不能换一家条件好的医院。”我让妻女陪护二姐，拽着外甥去城区寻找理想的康养院。

在路上，外甥说他一个月收入七千元，房贷、车贷，儿子在外地上大学需要钱，小女儿上幼儿园每月也得几百元，可以说是月月捉襟见肘，再加上母亲有病，从年初到现在医疗保险以外就花了六七万，实在是难啊！外甥还说，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已到中年，现在这帮人的父母大多六七十，开始闹病，不管不行；管，经济压力、精神压力太大了。

外甥开着车，没看到他的表情，但从后面望去，他头发稀疏，头皮清晰可见，像是被洪水冲击后贫瘠的丘陵。透过车窗望去，故乡那瘦弱的田野上，一棵棵白杨树在风的吹拂下，枝条左右摇摆；天空半开半合，射下的阳光很是纤弱，说不清是明是暗。

四十多年前，也就是我跟哥哥、三姐相继考学进城后的那些年，不到六十的父亲已摆开养老的架势，时常蹲在椅子上喝酒，地里的农活很少动，几乎全靠二姐、二姐夫支撑着。二姐结婚后七八年没有生育，再加上二姐夫干活不惜力气，过秋过麦，他们就成了主角。无论上学还是工作后，记得有很多次，黄昏时分，我从城里回到家中，就看见二姐、二姐夫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锄镰锨镢，满脚泥土地走进家门。有一次，刚进门就听到争吵声，是父亲跟二姐夫抬杠，就听二姐夫说：“光动嘴不动手，你能你去干。”“滚！”是父亲的吼声。二姐夫没吃饭就跑了，二姐哭着追出去。听母亲多次说过，二姐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上学时，二姐是非常优秀的，年年三好学生。1962年，全家随父亲从城市回到乡村，可谓一落千丈，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大姐二姐，这种冲击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辍学，为此大姐二姐不知哭过多少场。哭是没有用的，她们不得不用柔弱的肩膀帮父母挑起生活的重担。用母亲的话说，有要好的心没有要好的命，人不能跟命争。

后来，二姐生了外甥，孩子的欢笑给苦涩的日子增添了甜蜜的色彩。生活有了奔头，二姐与二姐夫的感情也逐渐好了起来。夫妻二人天天起早贪黑地忙碌，用汗水勾勒着一个个灿烂的明天。可天有不测风云，外甥大学刚刚毕业，家庭状况稍有起色，二姐夫却在一次工程施工中摔成重伤，虽经多处治疗，还是撒手而去。生活刚刚露出笑容又闭合了。外甥工作几年后，娶妻生子，二姐辞掉农事去看孙子。逐渐适应城里生活的她，把农村的房子卖掉，又筹措了点钱，在城区买了套几十平米的二手房。冬暖夏凉，有个独立的空间，也算享了点福。有几次见面，二姐说学会了广场舞，晚上听着音乐，伸胳膊伸腿很舒服。在城市文明的熏染下，二姐那紧缩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所以，当刚过七十的她病倒后需要康复治疗，被安排在乡镇卫生院，环境与硬件的落差，几乎要把她摧垮。

跟外甥到了城区的养老服务，面对整洁、舒适、宽敞明亮有地暖的房子，没再犹豫，给二姐订了单间。一个小时后，把二姐搬到这个温暖的地方，她脸上有了笑容，我们也算释怀。

此时，橘红色的落日余晖透过窗子洒进来，映在二姐脸上。她的脸上有了光亮，是之前很难看到的光亮，干净、温暖、幸福，让人感觉来日方长。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诗人书画院副院长，济南周三读书会创始人。)

一叶之舟

二姐，我来了